

科学研究要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生物系 蒲蛰龙

全国人民期望已久的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关怀和领导下胜利召开了。这次会议是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批林批孔运动取得很大成绩，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下召开的。会议自始至终充满着欢欣鼓舞、团结战斗的热烈气氛。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我能够参加这次大会，感到无比兴奋。在大会上，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这次大会通过了新的宪法，规定了今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任务。大学的理科教师，担负着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和进行自然科学研究的双重任务。今年是我国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大会号召我们要完成和超额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为在1980年以前实现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步设想打下更牢固的基础。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发展工农业生产、巩固国防而搞好科学研究，是自然科学工作者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们自然科学工作者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才能保证科学研究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就说过，应当把科学技术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了“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体育卫生、科学研究都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给我们指明了斗争的方向。自然科学是生产斗争知识的结晶。自然科学就它反映自然规律这一点来说，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我们必须看到，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是离不开社会制度和阶级斗争的，而科学工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有其社会根源。

我国古代自然科学是有辉煌成就的，我们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作出过伟大贡献。但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儒家的反动思想政治路线，曾严重阻碍了我国自然科学的发展。鸦片战争后，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自然科学不仅大大落后，而

且受着帝国主义的控制。近百多年来,我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受欧美资产阶级的影响是很深的。而我国的科学工作者,尤其是那些来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除了受其本身的阶级地位影响以外,也受到了西方科学思潮的影响。从十六世纪以来,欧洲的自然科学随着资本主义工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而迅速发展,资本家逐渐雇用大批科学工作者,驱使他们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他们研究改进科学技术,提高工农业生产,是为了不断榨取工人的血汗而获得更多的利润。资本主义发展为资本帝国主义之后,有些科学工作者又被驱使去为垄断资产阶级进行侵略和掠夺服务。这样一来,这些国家的一些科学工作者就变成帝国主义的帮凶了。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愈来愈尖锐,加以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哲学渗透到自然科学领域中来,有些科学工作者就感到精神空虚,以为自然科学的任务只能是追求“自然界的真理”、揭露“宇宙的普遍谐和”,把精神寄托于脱离社会实践的所谓“纯理论”的科学研究。他们宣扬“为科学而科学”的思想,企图以此来逃避现实的斗争,但结果只能是散布悲观主义的毒素,把自然科学工作引入了歧途。这些论调倒是与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相符合的,资产阶级正可利用它来掩盖他们把科学成果作为侵略战争和经济剥削的手段的罪恶行为。因此“为科学而科学”这个口号,得到了资产阶级的支持。在旧社会,我国不少科学工作者也宣扬过“为科学而科学”的思想,这种论调也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支持。解放后,我国科学工作者的资产阶级思想正在逐步得到改造,广大知识分子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逐渐把立足点移到工农这边来,使自己的知识与工农业生产相结合,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坚定了知识分子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断前进的决心和信心。在热烈欢呼四届人大胜利召开,学习四届人大文件和贯彻四届人大精神的时候,我们科学工作者应当严肃考虑怎样执行宪法,特别是怎样执行宪法第十二条的问题。

科学工作者要切实执行宪法第十二条,首先必须从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理论的高度去理解为谁服务的问题。我国解放以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从来没有停息过。由于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企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不断和我们进行斗争。在意识形态方面,经过了一系列运动,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思想逐步得到改造,但要实现世界观的根本转变,还必须坚持长期的斗争。由于阶级斗争的存在,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使自然科学工作者的“三脱离”有了滋长的土壤,潜伏在他们头脑中的个人主义名利思想的毒素会经常冒头。这些东西,恰恰是国内外阶级敌人妄图颠覆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所要利用的。作为一个革命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如果不从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不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高度去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不注意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不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那就很容易使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背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正确方向而走到邪路上去。

科学工作者要切实执行宪法第十二条,必须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参加

三大革命运动。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科学工作者如果不到工农中去，不注意世界观的改造，不向工农学习，就不懂得工人农民的生活、思想和感情，也不可能使科研成果及时应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校昆虫教研室曾与有关单位合作研究利用平腹小蜂防治荔枝蜡象。当时受到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研究了四、五年还不能较大面积地推广。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9年下半年到1970年上半年，我们在荔枝产区东莞县进行教育革命实践，和贫下中农一起举办短训班，仅仅花了大约七个月时间，就把这个以虫治虫的新技术在该县普遍推广开来，并且不断改进和扩大应用。我校昆虫教研室从1973年起与四会县大沙公社挂钩，我们一方面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又与贫下中农一起开展以生物防治为重点的水稻害虫综合防治。这种防治方法，效果显著，为贫下中农所欢迎。在田间试验过程中，结合实验室试验，我们又初步摸索了一些水稻害虫及其天敌的数量变动规律，为稻田生态系统的演化理论研究提供了依据。如果不是和贫下中农共同战斗，我们的科研工作根本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经过这几年的实践，我们重温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和“**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等教导，感到多么亲切！

科学工作者要切实执行宪法第十二条，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毛主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周总理在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这条路线使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的封锁，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壓力，并号召我们要永远坚持这条路线。我国在农业上取得了连续十三年丰收，在工业上，石油勘探和开采的成功，成昆铁路的建成，万吨级远洋货轮的三万二千吨的胜利航行，刘家峡水电站的胜利建成，在科学技术上，氢弹试验成功，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结晶胰岛素的人工合成等等，都是广大工农群众和科技人员坚持这条路线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为我国科学技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做出了榜样。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正确对待外国经验。我们搞自然科学研究的人，由于过去受洋奴哲学的影响，往往辨别不出那些是好经验，那些是坏经验，甚至有人认为凡是外国的经验都是好的。约在1945年，一度被称为“划时代”的杀虫药剂滴滴涕作为商品出售之后，各国争先仿制，大量应用，当时对于各种害虫的防治，效果也较显著。我国解放后不久，也成功地生产并大量应用它。但是，这种杀虫剂，在各国使用了若干年之后，发现害虫对它产生抗药性，用量愈用愈大，又大量杀伤田野、水域和森林的有益动物，如鱼类、鸟类、蛙以及许多害虫的天敌，更严重的是对高等动物的肝脏有影响，在动物试验中甚至发现它会导致肝癌的形成。这种药剂在农作物上的残留量，被人们从食物中吸收后长期积累于体内，会产生毒害。由于滴滴涕这一类有机氯杀虫剂的害处较多，近年来，许多国家已禁止

用于农作物害虫的防治，虽然滴滴涕还可用于卫生昆虫及其他一些害虫的防治，但用来防治蔬菜害虫是很不适宜的。又我们仿制外国的农药西力生，也曾普遍用于粮食作物害虫的防治，近年来发现它对人有明显的毒害，已停止使用了。这都是近十多年来，我们在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工作上学习外国经验的一些教训。近几年来，我们搞生物防治，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有不少自己的经验。因此，我们必须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要打破洋框框”的教导，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结合我国工农业生产实际，认真总结经验，闯出一条自己的科学发展道路来。

科学工作者要切实执行宪法第十二条，必须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肃清林彪修正主义路线及腐朽的孔孟之道的流毒。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遵循古为今用的原则，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总结我国历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经验，继承和发扬我们民族优秀的科学遗产，批判自然科学领域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使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更好地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我国历代的自然科学，是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长期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例如，流传已久的螟蛉蝶蠃问题，唯物观点和唯心观点之间的争论，从第一世纪到十六世纪持续了一千多年。《诗经》记载了“螟蛉有子，蝶蠃负之”这一自然现象。一世纪的扬雄在他的《法言》中，写下了这样的臆说：“螟蛉有子，蠃而逢蝶蠃，祝之曰，类我，久则肖之矣。”这种化生的说法，历代都有其支持者，如汉代的郑元、唐代的李含光等。对于这种唯心的化生说法，一千多年来有些人通过正确的科学观察给予了多次的驳斥，梁代的陶弘景在他的《召送别录》中，第一次提出这样一段正确的记载：“今一种蜂，黑色，腰甚细，衍泥于人屋及器物边作房，如饼竹管者是也。其生子如粟米大，置中，乃捕取草上青蜘蛛十余枚，满中，仍塞口以待其子大为粮也。其一种入芦管中者，亦取草上青虫，诗云：‘螟蛉有子，蝶蠃负之’言细腰之物无雌，皆取青虫教祝，使变为己子，斯为谬矣。”在陶弘景之后进一步观察蝶蠃生活习性而加以补充说明的，还有多人，一直到了1578年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出版，他经过亲自观察研究，肯定了陶弘景的正确观察，才胜利结束了这场论战。我国古代自然科学是在斗争中前进的。现代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使自然科学领域里的思想斗争更加尖锐、更加深刻了，正如列宁所说：“自然科学离开哲学结论，无论如何是不行的。”我们应该结合当前三大革命斗争运动的实践，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深入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用马克思主义占领自然科学阵地。

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胜利结束了，我欢呼，我歌唱！我要牢记党的基本路线，努力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明确自己的工作方向，同工农兵结合，自觉改造思想，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密切联系群众，向青年人学习。我决心在党的领导下，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鼓足革命干劲，努力完成四届人大提出的战斗任务，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贡献力量。